

什么是诗:

女性事件与环球摩登女郎

[美]白露 杨迪 陈静译

内容提要 以伊懋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黄宗智、维克多·李伯曼、彭慕兰和王国斌为代表的一批亚洲史专家借鉴区域理论对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我从区域主义者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判之处出发,集中论述1919~1941年间在全球爆发的“摩登女郎”现象这一历史案例,提出以下观点:摩登女郎现象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女性事件的一个标志性案例,有其内在的事实程序和事件性特质。女性的特殊性并不依赖于区域地形学。以女人为主题的、独一无二的普遍性事件,就是拉克劳所称的一种具体的抽象或者世界范围事件,也就是巴迪欧所称的“事件”。“女性事件”(the event of women)是指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政治领域中,发生在全球殖民现代世界中的特定的历史启示。蜉蝣广告这种视觉图像就像一种诗意的表达。与其他现代绘画类型一样,商业艺术事实上是一种女性图像和商品图像的自我指涉性的、有组织的经验。通过这些商业摩登女郎广告战的例子,关注的是资本(一种普世价值)与其在本土的范例。这些海报以图证明了一系列内在关联的现代女性的图像和图像中女郎出现之地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的其他景观”之间的同形异性性。这些商业女性图像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治理术、公民的现代文化话语中的“女性”概念,出现在从埃及、中东到日本殖民地、印度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同时,与这些图像的相似的内容和与之相应的力量也通过呈现一种同形异性性或者无限异质的、多种声音的图像,向历史学家呈现一种视觉的诗学。

关键词 世界体系理论 区域主义 女性 事件 广告蜉蝣

伊懋可(Mark Elvin)、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 Frank)、黄宗智、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彭慕兰和王国斌等一批杰出的亚洲史专家,一直以来都在通过区域理论持续不断地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评和修订。针对区域理论所认为的,中国与欧洲的发达程度自1880年后开始出“大分流”(the great divide)是基于某种历史偶然性因素,《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策划了一场一位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家与一位倡导区域理论的杰出历史学家之间的辩论,以期能够正本清源。在这场辩论中,黄

宗智指出区域主义历史学家是以环境性因素替代生产的历史性关系、马尔萨斯制约以及停滞的劳动力衰退等长期过程^①;彭慕兰,这位知名的区域理论学者则认为,对比英国,中国在19世纪的地位突然衰退可归因于英国煤炭工业的加速发展和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并非缘于中国内婚制乡村的贫穷化、中心—边缘关系或者资本积累的内卷化。^②因此,论及19、20世纪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主导世界,而中国却灾难深重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一种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交换体系中,民族经济处于底层且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归因于英国所具有的后发的和偶然性的优势。而这一优势是在

一种被称为“欧亚”的文化、政治连续体内的非系统性浪潮中脱颖而出的。

彭慕兰在辩论中界定了“欧亚”这一空间概念。他的区域主义的系列观点有助我证明为什么“女性事件”在有关全球历史的思考中能引发如此有益的危机。包括彭慕兰在内的区域主义亚洲史专家持有的观点是,前现代的欧洲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基本是类似的,不仅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绵大陆板块的两极,而且,它们的连续性也从最本质上赋予了其基本的相似性。这种假设的相等性意味着历史上的欧亚是同构的。这不仅是在大陆陆块意义上的,也是在整个大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因此非洲、美洲甚至澳大利亚就被隐匿掉了,欧亚(亚洲的西方,不是那个“西方”)成了现代社会的杠杆。无论是“亚洲”的精准含义是指中亚、中国或是东南亚,像彭慕兰这样的区域主义学者,都或显或隐地把这些案例放置在这一框架之内。差异性从属于相似性。在欧亚区域主义者的著作中,世界体系理论中两种不对等的实物成为了一系列类似物质中的某个单一物质(煤矿)。现在可以看出聚焦欧亚的研究实际上反驳了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理论概念性地边缘化了亚洲,所以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例外主义”理论为中国的落后提供的解释就值得怀疑了。落后的原因包括:中国稳固的皇权政治专制、可疑的民族同质性和所谓的社会一致性。^③

维克多·李伯曼则尖锐批评了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著作,竭尽所能地探讨了对于像他这样一位主要关注欧亚的区域理论专家力求将关注点集中于欧亚时所承担的风险是什么。^④他引用了《欧洲历史编年史中的反形式主义的趋势》中的话,然后评述道:首先,即使是现在前卫的欧洲人也已经不再欢迎这样的观念:欧洲脱胎于一个更合理有效的经济或高等文化遗产;其次,沃勒斯坦自然化了欧洲经济和社会动力机制(日本历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主导时期也采取这样的策略);最主要的,正因为历史偶然性优于沃勒斯坦的系统分析,所以欧亚史专家尤其适合揭示通向现代性的另一种经验的、历史的路径。李伯曼的研究案例是在十个世纪中都占据中心地

位的东南亚,在这段时期里,东南亚这个框架包括了所有欧亚法国、俄国、日本、某些时刻的中国和印度次大陆。李伯曼主要关注“一种更包容、更少对抗的欧亚差异”,而非欧洲例外主义或者中心—边缘系统,他提出:除了地理和其他内在差异,为什么欧亚范围的相似性在历史上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的确,李伯曼也强调“全球同步性”,但是他假定除了资本(货物和金银)之外,还有两种同样重要的远距离交易因素:生态的(技术、疾病、收成)政权和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和行政的观念。接着他证明为什么这些差不多分量的原因和因素,在几千年的考量中,其重要性总是依情况而摇摆不定。他的“欧亚命题”包括七个随之而生的主张。其一,欧亚是从地理上被分割成开放的中心地带和受保护的边缘地带,包括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公元900~1300年时期形成的那些“特许国”。其二,特许国瓦解之后,紧随而来的是典型的欧亚行政制度治域下的疆域合并。其三,遗留的次区域遵从了一个普遍模式,即不定期的政治集权化和崩溃,这促成了欧亚文化变革的革命性的积累。其四,在16~19世纪这一矛盾重重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泛欧亚文化集合所导致的“有界限文化认同”或者差异显著的原型—民族国家。其五,1450~1880年标志着欧亚范围的“早期现代时期”。其六,本地精英和精英人口(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的)的停滞对这时期的欧亚起到了稳定作用。其七,欧洲崛起是欧亚处于欧亚那一端的亚洲进程部分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欧洲的独特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欧亚那些受保护的边缘地带尚未被染指时,中国、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岛屿亚洲就已经同时感到了“征服精英”的威胁,李伯曼称这些“征服精英”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波斯人、满族人、荷兰人或者伊伯利亚人”,他们打断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区域同步性,输入了暴力、殖民征服形式。这个事件给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偶然性的可能。^⑤

李伯曼充分表述了有关一个同形的、类属的欧亚观念。我的论述主要致力于讨论女性的特殊普遍性是如何在亚洲的纷争之域落地的,因此,我

之所以为什么不选择区域主义作为策略,正是因为它不能取代世界体系理论。同时,在我看来,区域主义者倾向于强调世界体系历史编年中的核心问题,这正是女性事件的历史可以帮忙解释清楚的。

区域主义者的最大的困境在于它用一种关于证据的辩论去取代一种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李伯曼的研究运用经验主义的证据来强调政治代理人的高度内生、本地化的独特形式。为了避免一种简单的断言,即欧亚的分类是以“数据的方式”呈现的,李伯曼借助了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来支持其证据普遍化的观点。^⑥这本书对于李伯曼的价值在于以理论化的术语讨论了偶然性和身份认同问题。在此基础上,李伯曼提出本土历史代理在更大的欧亚遗产中发挥了创造性的作用。正是这些前殖民主义的精英们阐释了奠定南亚特权州、管理层、早期现代国家的千年工程中的“一种政治关系形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一种形式”。李伯曼所说的,真诚的本地政治代理,渗透着地方性知识,因此也绝不可能属于一个普遍世界系统中的自发性。^⑦但是这种策略能否躲得过陷阱,还是不明确。拉克劳和墨菲事实上是政治哲学家,他们假定霸权是一种策略性工程,承诺从政治行动者的位置可以产生出一个优先的结果。在政治代理人的视野中,未来居先性和高度自觉性是预设的。但在任何情况下,政治理论中的不确定性与历史证据的模糊不清性都不能混为一谈。

与之相关的一个议题是,“欧亚自身是一个统一的、互动的地区”的观念自身的模糊性。实际上,我们不能忽略李伯曼关于历史体系内质的本土化论述也是其关于前资本主义政治和区域政治形式的看法。因为担心其对于欧亚中的整体迷恋被质疑为一个新现代化项目,李伯曼提出他的项目是一个“达尔文项目”,而欧亚是“一个大属/种”,包括了“早期现代政治/文化动物”。作为一个达尔文历史学家,他的项目事实上是剖析那些有着“最强的进化亲缘关系”的国家。这也就是说,李伯曼著作中的体系特质的显著之处来自于进化生物学,概言之,其任务就是将导致多样

性结果的“变量解析出来”。这是一个关于基因选择的高度理论化的工程。我并不关注李伯曼的这种半戏谑的声明,提及这一点仅仅是为了让大家都注意到,自诩为区域主义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艰难任务。透过区域的棱镜对世界体系的批评,通过以地形学、天气、疾病矢量图的循环、煤炭、木材、女性气质等为基础重新绘制全球,让我们注意到,我们需要认清具有全球影响的事件是如何从亚洲区域、次级地域的复杂社会、贸易循环以及其所处的政治文化中发端的。但是区域主义者造成的风险是将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系统理论倒置,并且从文化主义、发展以及进化论术语角度再度诠释它的系统性。

语境——依赖和历史性的条件

但是如果一个事件既不是地区性的——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但却发端于亚洲,而亚洲在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故事里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原点。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类属的主体的女性,在历史视野中的出现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有用的事件。从区域视角出发,对照我们通过批判世界系统所看到的问题,我提出几点考虑:第一,这是由拉克劳已经完全表述清楚的问题而引发的,拉克劳认为“什么是语境依赖和历史性这样的问题的条件……(同时)为了让一个对象具有真正的历史性,其是如何被建构的?”^⑧接着,第二,巴迪欧的问题“什么是诗歌?”这将我对历史性自身的讨论上升到了关于事件的问题分析上。在这里要讨论的历史案例是1919~1941年间在全球爆发的“摩登女郎”的现象。这一摩登女郎历史,是更大范围的关于女性的全球事件的一部分,与任何对事实的理解一样,有其通用的真理程序和事件性特质。对我而言,则是因为摩登女郎现象作为女性的历史事件,超越了地方的(或者用新地区主义历史理论的话说,“区域的”)意义。我们不能依赖于区域地形学来求索女性的特殊性,而以女人为主体的独一无二的普遍性事件,就是拉克劳所称的,一种具体的抽象或者世界范围的事件,也就是巴迪欧所称的“事件”。在现代主义视觉秩序以及资本主义商品文化中,这一主题已经得

到了极大的图示性说明,“女性”事件被表达为一种解剖学的、生理的、美学的、自恋的、法律的事件以及治理术中的一个要素。

既独特又复杂,女性事件符合巴迪欧关于普遍独特性的描述。^⑨对我而言其原因是,女性事件这一现代性的全球现象的必要因素,之所以被精确建构起来,其所依赖的正是世界范围内的野心,而这种野心必须同时得到“全球性”的承认才能接合起来。巴迪欧的哲学框架因而能够帮助我,去进一步地质疑世界范围内的那种尝试,其试图去重复与之前类似的模式——包括世界层级新欧亚区域主义。在与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探讨诗歌时,巴迪欧写到“诗歌教会了我们,世界并不呈现自身为对象的一个集合……诗歌必须安排一种具有倾向性操作的捕捉”,捕获世界和它的对象。对一个想要理解诗歌的人而言,“其并不是为了想要了解诗歌是什么意思,而是想思考诗歌里发生了什么”。^⑩以诗歌为类比(我将在后文中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有用的策略),我提出的问题是,在思考一个起源于“亚洲”这个地缘政治和文化空间中的“女性”时,什么将被从历史上证明是无用的,什么是更为显著的?什么又是被创造出来的?

厄内斯特·拉克劳对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语境——依赖和历史性这类的条件……(而且)对象是如何被构成从而具有真正历史性的?”在另一篇草稿中,我已经讨论了拉克劳的观点,他的意思是,尽管巴特勒可以在美国风格的社会学中形成她的哲学,但是她并没有能触及历史,这就影响到了她关于性别和性的概念,使之成为普遍的、历史的偶然性。我之所以回到拉克劳最初的控诉,是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处理所谓语境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试着去理解像环球摩登女郎这样的主题。拉克劳的基本观点是巴特勒根本不能承诺任何的普遍主义,也不能承诺“任何一个能够有效适用于一定文化语境之外的规则”。拉克劳指出,其历史性实际上与文化语境没有任何关系。从女性事件这个问题式来看,拉克劳的观点在全球分析的语境内是有用的。这是因为,正如我在

对地区主义的分析中所说到的,分析家发现,他们有必要回头再去重新搞清楚独特性周遭的语境。这也是对巴特勒的批判,因为在我看来,除了通过空间(区域)的“语境”或者性别群体的语境,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主体问题。

但是如果语境和历史性是同一个实质,巴特勒就必须得承认“在缺少可适用于特殊语境以外的类属的情况下”,没有理论或者理论家能够正常运作。如果多了解点哲学家之间的辩论,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主要在于,当巴特勒将“历史”与“语境”混淆起来,并试图历史地“阐明语境”的时候,她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她只能“通过具有超验的先验有效性的元语境话语”去说明差异,即语境。她所宣称的历史性势必背叛她自己的看法。拉克劳自己也将这种需求推向了历史性,并将他自己归类于哲学的历史决定者。他对齐泽克的批评正好与他对巴特勒的评价相反。齐泽克在否定的问题上停留太久,而且也太不加批判地拥抱了古代的陈旧腔调,即真实界没完没了地破坏了象征界的计划。但是拉克劳的观点还是重要的,特别是他提出“我们或将阐述的地点历史化,而完全不考虑陈述所具有的普遍性程度,或者赋予这种普遍性程度以合法性”,他补充道,“普遍性程度只有通过将阐述的立场超验化才能够实现”。^⑪

历史性与变异性有关。但当变化有了一个限制的时候(具体点说,比如,使欧亚被特征化,并且成为一个“非—非洲”区域的那些区域性变量),我们就自动面临了一个“本体的”问题,一个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论历史是从哪种现场或者语境中写就,历史都必须是真的。因此,援引与历史相关的“语境”也就陷入了双重困境,其如拉克劳所说的,这一困境是根植于巴特勒哲学主张之中的。如果我同意欧亚是从一个个可被普遍认知的变量(变化)集合中切出来的一块,而这变量是完全可以进行计算或者被确认无误地予以说明的,那我就设定了一个积极的限定,而这有可能会削弱我关于历史的清晰论断。我或许可以争辩道,这样一个策略为一个单个的问题或者真理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事实上,我已经冒了风

险,使得知识语境化并变得模糊,而且在除原初地之外完全无效。另一方面,如果,这正是拉克劳指责巴特勒所做的,我们将变异性定义为必须总是局部的或者总是在流动中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用但并不是历史性的前提条件。其有用性在于它将一种社会理论放置于变化或者流动之中,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公正的社会理论策略,但事实上,在历史的意义上并不依赖于语境。只有在“能够断言结构局限性的非历史性意义”的情况下,普遍性才能历史性地被满足或者成立。因为对拉克劳来说,这个研究是为了仔细考察游戏中的游戏从而利用能指,“能指不必依附于任何精确的内容,能指简单地命名了对历史局限性体验的正反转:比如,正义,是对一种广泛蔓延的不公正感的反对”,宣称历史性对他而言不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拉克劳所反对的巴特勒的观点,一部分是根植于她的历史观中的系统性以及她推断的方式,推测在历史和抽象之间存在着调和。他认定她对(存在调和的)原因的判断是一种暗示性的黑格尔式的思维。当他们在他们的辩论中发现了在她的“文化翻译”的概念中实际上有他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她以一种历史确定性的名义从抛弃的抽象中收回了承诺。运用她的翻译范式,她着手开始了一个研究,而这个研究在拉克劳的理解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与他的具体的抽象的概念、他关于对等性和领导权的普遍性逻辑的讨论是一致的。但是在这里,历史性问题已经被耗尽。在这场有价值的辩论中,两个政治哲学家将历史性的问题辩论带至终点,从他们的交战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已经无可回旋。我们无法将一个反思霸权,为了应对当下全球政治危机,试图再思考替代性选择方案的政治工程,扭曲成一个历史理论,为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欧洲固着或者欧亚中心方案所带来的困境提供出路。

摩登女郎诗学

如前所述,巴迪欧的问题,“什么是诗”将我的讨论从历史性本身转移到了有关事件(the e-

vent)的问题和状态之上。^⑫接着就有了一个议题,关于在1919至1941年两次大战之间在全球涌现的“摩登女郎”的历史现象。^⑬在对摩登女郎形象的表现方式进行了调查之后,“环球摩登女郎研究课题”总结到,每一种呈现都“从不同民族的、殖民的和种族的领域内汲取美学元素进行组合和重组,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化的’样子”。研究还表明,“这些特征使得摩登女郎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启发式的类型,使我们得以分析全球进程是如何与性别化的、种族化的全球等级和特定场域内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相互交织并且被重组的”。非洲研究专家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 Wilk)在他有关选美竞赛的著作中暗示,这种“一般差异结构”在其议程可称为“性别化的现代性”的合作项目中成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组成要素。研究者们试图将性别现代性放置于正在进行的有关如何赋予现代性以特征的辩论中,这其中包括我自己有关殖民现代性的讨论思路。^⑭这里特别强调的也是合作项目着重关注的,由此也具体化了“一个商品化的摩登女郎是如何被认识、消费并且为本地人所明白的……摩登女郎传达给当代的是现代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以及她如何在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形构中发挥作用的”。

这个项目并不是寻求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清晰的理论或者批评,但是,因为合作的规则要求项目成员发挥其特长,在每一个特定地区和领域研究内认真地对待知识生产。这个决定通过将研究的重点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了很多人肩上,确实解决了大范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保证研究都能建立在每一个领域的档案基础上。然而,这种共识,即合作的相互尊重原则,还是产生了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某些地区的特殊化中批评走向世界范围,由此则走向了殖民边缘的问题领域,或者已经初步开始着手解决顽固的悖论,比如“世界的民族社会主义”和美国的种族多元文化主义。

摩登女郎现象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女性事件的一个标志性案例。女性事件在世界系统理论中并没有被充分考虑到,而因其在缺席和再次出现,在

全球的理论系统分类中开启了一个有用的缝隙。我所说的“女性事件”是指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中、在全球殖民的现代世界中,发生的特定的历史启示。在那个时候,一个新近才被认识到的政治形态——女性——有了一个名字,变成可以命名的,并因此形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女性”这个名字特殊化了一个主体,与男性平等地一致,但也平等地不同。这个宣告“女性”的事件,它的独一无二性或者说新奇性已经出现在庐古德(Lila Abu - Lughod)、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比丽·麦曼(Billie Melman)、孟悦、戴锦华、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库玛丽·贾库瓦德娜(Kumari Jaywardena)以及其他区域专家、档案研究者、追随者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⑮每个学者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时对这一发现进行论述,但都没有合适的词语去本土地名命名这个将所有的民族、所有人、所有政治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普遍主题。最后,女性事件的真理是“与每一个社群子群的非直接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康有为、谭嗣同,或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或者秋瑾等有关的女性真理的说法,不是一个对前一存在(pre-existing)的身份的声明(既不是一个非名词或一种亲属名词),或者是对一种排他性的分类(除了甘地再没有人声称自己是或者他体内存在着一个女人)。^⑯

在跟踪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激进女性主义的话语之后,我确信,女性作为一个排他性分类以及作为主体的女性(或者更准确地讲,单数的女性)是中国殖民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部分。在菲利普·考瑞根(Philip Corrigan)和德里克·瑟耶(Derek Sayer)受到毛主义影响的经典《大拱》(The Great Arch)中,有关英国现代性的文化生产的最初洞见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之前的著作也已经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事例,但那是从中国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理论家的事件开始的。然而,在阅读了大量中国作家,我最终称之为激进女性主义的著作后,除了找到女性主义的主体“妇女”作为一个话语主体同时或者同步涌现的记录外,我还遇到了一个分析上的根本困境。如何理解独特性(像女性,这样的现代主体

的出现)与多样性(多个案例显示了,主体同时出现在遍布全球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如何理解具体化的抽象女性是在类似中国女性主义这样的政治理论、广告和社会学书写中,在全球流通的理论中,以一种个性化的、体验的真实性的方式被抽象地描绘的?为什么像“摩登女郎”或者“新女性”这样的名称向历史学家呈现的并非一种情况:这些名称引发了一种普遍的、超越了妇女的社会学范畴的本土(用新区域史的话说,区域的)意义?^⑰

有一种办法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去收集证据论点。比如,可以很容易证明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资本扩张的技巧是什么,同时将之与工业生产的商品中出现的新市场与女性形象——“商业女郎”联系起来。^⑱出现在被殖民的中国部分地区,比如天津、上海,特别是日本占领的满洲区域的广告图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举一个化肥的日历牌广告的例子(未注明时间的卜内门公司肥田粉女郎月份牌,大约是1926年)。在这个广告中,一位非常优雅的女士站在一个石头围起来的荷花池前。她身着高领旗袍,佩戴珍珠项链,外裹一件领子和袖口上为人造皮草的天鹅绒长袍,肩膀上还有一枚莱侖牌(Lalique)胸针。一片盛开着椴树或者李子花的农田映照着她精心装扮的脸庞,她的目光凝视着那些未来的消费者。在这幅画面的旁边还有这么一句话“一品蛾眉牌完美肥田粉收成丰富获利优厚,蛾眉月牌肥田粉各种植物均极相宜。”围绕其一圈的是以新传统风格绘就的农夫耕作的场景:农夫们一边扛着粪筐,擦着汗,一边从他们驮着的篮子里把动物肥料撒向田野,前方还有一头拖着木犁的水牛。在池塘远处的岸上有一座乡村别墅,墙上绘着商标和广告语。广告的上方是一个邀请“请用卜内门肥田粉。”两个鼓囊囊的产品袋完整了这个画面,而他们的商标,翘着的大拇指,出现在图画各个地方。其出现时间大概是1926年。^⑲

这个女郎是谁?在这些高档、时尚的衣服下面她的身材又如何?这神秘的田园景色到底是哪里的呢?新生的商业艺术与她的身体形态之间的

关系又是如何? 这些彼此关联的问题并不复杂, 关于地点和时间的研究已经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比如, 同样穿着满族高领和设计师款的法式改良外套的形象等出现在日语的上海报纸《上海日日新闻》和一份在沈阳出版的中文的满洲报纸《盛京时报》上, 还出现在 1927 年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上, 而这份画报的读者都是来自北京、上海、沈阳、欧洲和美国的最新髦的上层社会女性。

卜内门女郎并非一种转瞬即逝的模仿, 其并没有模仿安·芮腾郝斯(Anne Rittenhous) 在上海和美国两地出版的《星报》每日专栏“穿着”里的巴黎时尚插图或者诞生于中国的英文报纸《上海泰晤士报》上的“时尚提示文集”的插图。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些受到欧洲或者日本启发的、代表中国文明的新女性图像在现代殖民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分类的秩序中是有迹可循的。亚洲内陆的时尚模特的国际化形象是一个使得殖民主义成为一个现代性工程的组成部分的明确图示。

有关什么使得空间成为了一个区域——“亚洲”的问题, 这同时也是另一个问题: 能够在不援引像欧亚这样的同构或象征性政治地域的情况下开展历史研究吗? 卜内门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ICI] Ltd.) 的中文名字。公司始建于 1926 年, 约翰·布拉诺(John Brunner) 和路德维希·蒙德(Ludwig Mond) 将他们的苏打粉化学生产企业卜内门公司(Brunner Mond Co. 始建于 1873 年) 与诺贝尔工业公司(Nobel Industries, Ltd.)、联合碱业公司(United Alkali Company) 以及英国染料公司(British Dye-stuffs corporation) 合并, 以对抗于 1925 年成立的德国法本公司(I. G. Farben AG)。Mond 是中国品牌名字——卜内门(Bu' nei' men) 中的那个符号或者说直译的元素。在 ICI 成立之前及之后, 殖民扩张都是其商业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中山太阳堂(Nakayama Taiyoudo 或者 Club Cosmetics Company of Osaka, 创建于 1903) 在 1911 年进驻中国市场, ICI 的前身“卜内门”也在 1899 年进入中国市场。卜内门独特的灵活管理结构及其绕开买办机制控制中国苏打粉销售和流通市场四十年的成绩, 招致了其他商业帝国主义者们的嫉

妒。“请使用卜内门”海报中的女郎很可能就是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当时民族企业家范旭东在 1914 至 1917 年建立了永利—久华化学联合公司, 迫使卜内门采取抵抗措施, 启动新一波广告推广。当然, 为了打压卜内门, 范不得不与中国政府、各路军阀、三井化学(日本国内市场) 和 ICI 打交道。事实上, 到 1937 年永利—久华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55%。

在此, 从政治符号学意义上, 企业帝国主义和殖民现代性从逻辑上建构了地域的概念。商品图片中的卜内门女郎伫立于被开垦的田野中, 衣着优雅, 搔首弄姿, 正是“亚洲”殖民现代性的能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例, 但也是中国类似图片中的一个。另一个例子, 可以说明现代女性形象如何通过像广告月份牌或者重复的新闻广告的蜉蝣印刷物意指亚洲殖民现代性的, 那就是佑天兰(Utena) 护肤产品的俗套广告(佑天兰面霜, 《盛京时报》1939 年 7 月 30 日)。这个广告定期出现在日本主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上。该报纸在沈阳出版, 当时是日本殖民时期, 此城被叫作“奉天”。报纸上的日期是“7 月 30 日, 康德年”。Kangde, 中文发音, 或者 Koutoku, 是满洲傀儡皇帝溥仪的国号。溥仪是前清的统治者。这份报纸使用为傀儡君主溥仪登基而人为打造的国家系统标志政治时间。有意思的是, 佑天兰广告强调了其时政治时间的混淆性, 当佑天兰面霜或者粉被称为高质量的“国货”的时候, 通过用三种语言来介绍一个“国货”, 彻底模糊了这里的国究竟为“满洲国”、中国或者日本这样的问题。

我随后还会简要地介绍有关这个逻辑的更多细节。同样的逻辑在中山太阳堂化妆品公司的月份牌海报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司总部在神户, 于 1903 年合并而成, 但只有它在向中国市场推销商品的时候才是中国的。

20 世纪 20 年代, 中山太阳堂(CCC) 占据了日本岛三分之一的化妆品市场, 之后像卜内门一样, 开始随着日本占领满洲国(1931 年)、进军天津和上海(1938 年) 的脚步, 进军那些已经被彻底殖民化的市场。在其第一个产品(Club Araiko) “双美人牌洗脸粉”大获成功之后, CCC 委托东亚

公司(Dongya gongsi 或者 East Asia, Co.) 在上海和汉口的分公司代理 CCC 全系列的产品——牙粉、牙膏、脸粉、肥皂和化妆品,使用中国品牌名“双美人”(Shuangmeiren or Two Gorgeous Girls)。

CCC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致力于推广黑白、手绘或卡通图像的报纸广告闪电战,与之相比,月份牌海报的元素就不那么重要了。在出版于中国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报》上的广告主要针对已经建立了品牌忠诚度的日语读者;而在中文的《盛京时报》上则开展了一场坚持不懈、多种多样并且持久不衰的广告战。就创新性、持久性和多样性而言,仅次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战,只不过这次广告中的人物形象都是针对阅读日文的消费群。

殖民现代性和公司资本逻辑在一种具有日本风格的泛亚领域性的女性符号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这个中山太阳堂的海报中,一位具有明显亚洲长相的女孩,留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意大利式、和风、欧化的裙子,戴着南洋珊瑚项链,坐在那里,露出像蒙娜丽莎一般的微笑,向外凝望,膝头上还横斜着一个乐器。日文、俄文、英语的和中文都将注意力引向了“日本时尚俱乐部化妆品公司(CCC)”以及它那非常著名的两个女人的 sobi-jin 标志。其风格的诸种元素与中国发达地区现代性中的殖民日常物质文化相吻合,这些区域之所以发达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曾经被殖民资本占据过。我认为,说这个 CCC 女郎是一个浓缩的形象,体现了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文明”规制之下,韩国、中国或者满洲的主体必须实现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我断言,这种从西方的帝国主义和坏的东方家庭中解放出来的、现代化的、先进的亚洲俗世女子的日本原型,是无法与将这些广告中瞬息而逝的形象展现成中国女性的一种表征的殖民性,与再区域化政治以及现代企业资本帝国主义分解开来。或许与全球历史的发展时间同步,但不能与殖民的再区域化政治以及现代公司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拆分开来,这也表现出了这种蜉蝣般的广告图像是中国女性的一种表征。

但是这个 CCC 海报女郎的复杂性并不止于是一个饱和的视觉图像的事实,因为其构图是绝对诗意的。其诗意体现在这小小的图片中,就像

一首诗一样,是一种“确认和愉悦”,其重点不在于详细讨论构图中所暗示的边界或空间,而是站在边缘上说话。^② 图像完全忽略了外国故事叙述的指称性抑或一个可预见模型中的间接指涉。这个海报完全不是一个拟态影像。它不直接呈现任何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殖民现代性、企业资本、中山太阳堂、摩登女郎,作为历史术语在当时已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个广告,却像一首诗一样,在命名的熔炉中,消解了那些历史术语的所指对象,并由此消解了感知对象的时间性而给予他们以无限。因此毫无疑问地,正如拉康主义者很乐于指出的,“每个领域的真理都是由其自身的难以命名而在真实界中奠定了基础”在诗意的广告中构成难以命名的正是“女性”。为什么创造一个普通的女性形象就可以很自在地建立与从香皂到化肥等任何商品的关系?在巴迪欧关于诗歌的诠释中,他揭示了对“不可命名者”进行区分的必要性。这是因为他关于诗学的普遍真理形成于他区别数学(数学中语言的一致性的价值是高于其他的)与诗学(其所争论的其实是在没有一致性或者严格的参考性的情况下的语言的力量)之际。这两个领域都可以发现真理,但其所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规则。

当然摩登的、泛亚洲的、商业女郎的视觉图像不是一首真正的诗歌,但因它同样在语言的视域内运作,广告图像和诗歌具有相似之处,更广泛地说,艺术的有用之处在于提醒我们,视觉图像就像一种诗意的表达,不是外在于故事叙述的。广告这种类型并没有任何暗示其具有指称功能。想要掌握它那打动我们的力量,并不要求或者依赖于外在的故事叙述阅读。就像其他现代绘画类型一样,商业艺术事实上可以是一种女性图像和商品图像的自我指涉性的有组织的经验。将一种诗学改造成一种美丽的商业图片,原因之一是,“进入诗歌”的指令包含了放弃思考“它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去思考发生了什么,并且在此,我认为摩登女郎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是去思考在激发了女性事件的视觉艺术中发生了什么。在广告图像和在卜内门的海报中确实有些事情发生了。用当代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些图像是同形异名的,他们

是诗学同形异名的图像版本。^①

也就是说,我非常心安理得地使用这些商业摩登女郎广告战的例子去关注资本(一种普世价值)与其在本土的范例。这些海报以图证明了,一系列内在关联的现代女性的图像精准地出现在了同样的时间节点上:类似的图像出现在别的商业广告中、其他市场、新兴市场和想象的市场,出现在亚洲范围的蜉蝣物中。这是一种全球的广告项目。然而,我所关心的是一个解剖学上精准的封面女郎和这些女郎出现之地所具有的同形异名性,这些“使用价值的其他景观”持续呈现,内容生动,使得真实得以降临于在现代思想中寄予了“女性”之名的所在之上。这些商业女性图像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治理术、公民的现代文化话语中的“女性”概念,主体出现在从埃及、中东到日本殖民地、印度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运动中。然而这些图像的重复性和与之相应的力量呈现了一种同形异名性或者无限异质的、聚音的图像,向历史学家呈现出了一种视觉的诗学,其中全球的摩登女郎的女性特点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一种“感性的与理念的共同的扩展,但是并没有给予对于唯一的超越……(并且否认)任何与经验主义相似的”^②。直率地说,这些图像越同形异名,在我们看来它们就越普遍、越坚固,最终成为非常坚固的“女性”。它们不再成为国家、民族、宗教、种族、家族或者种姓制度的主体影响。

如何理解作为一种本质或者基本的“女性”主体是与这些蜉蝣是什么的问题相关,与现代商业广告图像做什么的问题有关。在我看来,同形异名的图像并不是表征,这是历史上阅读的传统策略蹒跚的地方。卜内门女郎图像,就像此类的其他图像一样,不是一种表征。这是因为,我们不能说它特别再现了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联想性的、唤起性的。除非一种语境是历史性的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这个图像有效地指向自身,不管是肥料或者牙膏,女性图像都是与现代女性的女性特征及其穿戴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内亚市场中的女性图像是自我指向的,向公众暴露了一个现代女性的身体。在这点上,卜内门公司广告图像

156

中,站在肥沃田野里的女孩参与到了摩登女郎启示的现代主义视觉政治中,但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现代女性身体与同一框架内出现的商品形式相似(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暗示了其在化妆品和肥皂的世界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将女性身体与一个化肥品牌联系起来的核心图像,表明它是商品—身体关系,而不是女性与化妆品的关系(或者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从类型上考虑这种关系在广告图像中有危险。

综上,我的总体观点并不复杂。首先,阅读卜内门图像时,不能将其放置于一种一对一的关系中去对应绘画中的某地或者某区域的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正如我之前讨论的,图像的力量历史性地来自于我们所知的,比如关于它的多种构成,社群的、民族的起源,特别是,20世纪前三十多年的中国商业艺术的历史与当代广告图像的复杂类属特质相关的部分、通用视觉性诗学以及现代的、殖民的女性身体的重组形态。^③用社会科学的话说,考虑到商品是英语商标,这些图片既不在文化区域主义(不管这个边界是多灵活或者“柔软”)之内,也不能限于一种被称作“西方”的原初观点中。这是因为,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其内在一致性的易于混淆性,尤其是在当时日本侵略的泛亚洲殖民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这种意识形态在当时为韩国、中国台湾、冲绳、日本和帝国的其他区域所共有。换句话说,这种蜉蝣的视觉图像既不是独特的或者唯一的、“亚洲的”,也肯定不是像长期在上海竞争的旁氏、柯达和福特汽车公司那样,是一个衍生项目。其次,证据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在于其解释时尚或者说明当时在亚洲现代性世界里的人的存在,而是通过对身体形象的商业性、机械重复性的展现方式,呈现了一种神秘的实质,并将之命名为“女性”。

哲学与女性事件

这些广告图片越同形异质,它们就越具普遍性。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转向一种事件理论,从而远离有关普遍与特殊、地域与亚地区、启示与实力、国际与民族国家、文化和元—文化等种种争论。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是复杂的,正如他

自己在其著作中所说的,这是一种哲学。我既没有假装哲学家也不在任何意义上从事哲学。我是被巴迪欧关于真理和思考的主张内容所吸引,并将之视为其关于历史的核心问题式。关于这一点,巴迪欧吸收了离世的诗人本雅明的观点,认为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必须从流动的时间中爆破出真理。巴迪欧断言“哲学自己并不生产任何有效的真理”。他提出“抓住真理,展示他们,曝光他们,宣布他们的存在”^{②4}。在他看来,这是今日哲学的存在方式,一种系统的、不言自明的、复杂思想形式:现代哲学“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信念,一种现代的信念”,从“我们的时代”这一事件开始。^{②5}巴迪欧提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或者哲学是从对有限性、局限性和本质的假设开始,而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很难将一种情况简化为有限的参数”,因为这种困难以及同形异质的问题是我们的时代的特色,也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思考,思想必须变得有限并且将自身向时间敞开。这部分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给予妇女事件合适的历史评价,有必要直接面对文化主义、区域主义和系统理论的双重困境。

在巴迪欧的“反美学”的概念里(一种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坚持艺术自身是真理的生产者,而不是将艺术转变成为哲学的客体对象……[并且]描述了某些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所产生的哲学上的影响^{②6}) ,他提出:当代哲学普遍地是“一种思考。(这种思考)从未定义它在想什么”,或者发现它是一种对象,但是“抓住了不明确的词语的精髓”(我加的重点)。正如我讨论巴迪欧的问题,“诗是什么”时指出,既然诗学是一种真理的程序,在诗学作品中遭遇到不确定的词语也是其条件之一。但是正如我所讨论的摩登女郎案例,摩登女郎是一个不确定的词语,只有和一种“女性”的分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而“女性”这个词语自身就是一个现代类属,并能够被历史性地描述。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女性是真理的主体,是与历史事件相关的主体,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什么可以在宣布存在之前存在。这触发了两个问题。首先,正如巴迪欧假设的“早期中产社会中的中心空虚”形成于马克思理论的“无

产阶级”的位置关系之中“女性”是20世纪思想家——女性主义者、人口统计学家、人口普查员、诗人和生物学家——给予现代公民权和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中心空虚的名字。现代中产阶级男人和女人的主要对抗是启蒙运动基础的缺陷,拒绝授予以女性身份存在的女性以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充盈主体。^{②7}这是巴迪欧的立场之于我的价值,让我在当代哲学思想真正遭遇了一个词,比如“女性”的时候,其意义并不在于去命名一个需要被再表现的意指,而是在于将其放置在一个序列中,在此序列中,这个词只有通过对其所创建的关系进行有序展示中才能存在^{②8}(巴迪欧哲学中的这个转折根植于他的信念,哲学上讲,本体论是数学的,这一点我并不延续追究^{②9})。

我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一个最近将巴迪欧推到社会理论风口浪尖的问题,即事件的问题化。在巴迪欧看来,当哲学抓住真理,展示它们,暴露它们,并宣称它们的存在,这也是“将时间变成不朽,既然每一个真理,作为普遍的无限是永恒的……(因此)哲学使得不同的真理得以共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其所说明的是时间的此在,在这个时间序列中,其作为从时间中浮现的真理的时间而运作”^{③0}。这个词,“共存”或者说“哲学的共存性”,指称巴迪欧不懈努力去证明哲学是如何能将“在某种系统形式中合而为一,从而使得这些当代真理得以识别和证实”。这种共存性的行为,也就是不断重复,哲学的特质,当代哲学作为不证自明的思考具有的特性,在本质上寻求的是昭示时间及它与普世真理之间的不可分离性,时代和它的普遍的、无限的思想之间的不可分离性。^{③1}

如前所述,在我关于卜内门和中山太阳堂广告战中女性商业图像的讨论中,女性时间是构成现代性的一部分,而这种共存性,是一种存在于不证自明的思想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历史关系之中。在我列举的例子中已经解释过了,“全球”的女性现象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范畴,是如何精准地与世界范围的野心一同被建构起来的,与此同时,它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被迫地)这种全球协议是被接合起来的。我的目的的关键词是“普

遍的无穷”以及多样性,这是因为我现在需要去展示的“全球”是如何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的。巴迪欧将真理分成四个条件的说法很出名,“数学、诗歌、政治发明和爱”,他的论点是哲学的任务,是去发展“普遍程序”,因为在我的分析中,定位事件性地点被证明是很有用的。^③

我也已经说明了,与社会、工人、学生及年轻人等范畴一样,女性对现代性而言是很独特的,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标记。核心问题是体系理论、区域主义者及其理论者,尽管他们都强调连续性和连续体,但都没能看到事件。拉克劳的问题是历史如何组织它自己的主题,特别是巴迪欧所要求的,我们要让历史知识去厘清其与不可化约的或者普遍的历史发明,一种有用的复杂世界范围内的分析。这篇论文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女性事件是定义所谓现代性如此必要的因素之一,缺席前资本主义或之后,抑或是其倒转版本的欧亚范式的世界性研究之中。同时,本论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殖民主义入侵问题。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女性事件从一个既非中心也非边缘的制度中产生。但这不是对“性别”历史的召唤。与其说,这篇文章是提出了几个既有范式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如说,其强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新的全球或者区域理论家如何应对全球的女性事件?这一女性事件是否依赖于新全球主义最终认为的那种附带性的文化因素?这一事件主要是文化的,还是说也反映了如弗朗西斯卡·博瑞(Francesca Bray)已经有力地说明了的那段历史,即中国的劳动力性别分工的历史变迁?世界系统理论如何能将劳动力的性别排除于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原因和一个指标之外?那又如何包括其中?或者说,齐泽克关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无限的多样”的问题,所关注的是,尽管许多女性主义学者都宣称没有女性这样一回事,但这成为了它自身论断的一个证据,为无穷的特定或者历史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参考。事实上,“女性”既不是一个可能的分类,也不通过无限的多样性而被认为是有效的,其是一个内在于现代性的事件,也就是说,女性的事件性内质不能够通过改变分析适用的“范围”或

者“单位”就足够说明了的。

- ①黄宗智《发展或内卷?——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亚洲研究》2002年第2期,“换言之,中国(或长江三角洲)被延迟的工业化无法用彭慕兰所谓的缺乏对煤矿的可得性来解释,相反,倒是对于工业化需求的不足可以解释中国煤矿业的发展停滞”。
- ②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亚洲研究》2002年第2期。对于人地比例的批评,见第546页;有关作为发展因素的贫穷化的权重的讨论,见第552页;关于资本积累、发展以及工业突破的策略之间关系的相关问题,见第553~554页。
- ③濮德培《中国征西》,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662页。
- ④李伯曼《形异神似》,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⑤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李伯曼只出版了这系列中的头两卷。第二卷关注的主题是相似性(similitude)、偶然性(contingency)以及欧亚区域主义。
- ⑥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沃索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李伯曼看上去最感兴趣的是关于“霸权兴起的一般场域”(对李伯曼来说,欧亚似乎就是一个兴起的霸权范畴)的论点,因为拉克劳和墨菲把霸权描述为“接合实践”的创造性行动,“是一个在其中的‘元素’还没有被凝结为‘时刻’的场域”。换言之,拉克劳和墨菲之于李伯曼的价值在于他们关于偶然性和身份认同的理论层面的论断。
- ⑦拉克劳、默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沃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 ⑧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编《偶然性、霸权、普遍性》,沃索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 ⑨参见巴迪欧《圣保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⑩巴迪欧《非美学手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 ⑪换言之,以巴特勒的思路来看,我们必须放弃将理论普遍化与历史特异性之间联系起来观点,或者,我们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抑或像她那样——黑格尔派的原理。其权威性来自于学者的立场——理性的特权。我将简短论证的是:在历史学家们(拉克劳对历史或撰写历史并不感兴趣)坚持滞留于“偶然性 vs. 普遍性”这个史学问题时,我们也正陷在类似的问题中。我们要么宣称一个因素或另一个因素是普遍的(中心-边缘交换、劳动内卷化、国家构建的进化)并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立法,要么冒险使用一个基于“偶然性”的策略。这里所谓的偶然性,也就是情境的另一种说法。这正是我打算以女性事件及其通用规程作为开头而非将女性解读为记载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更愿意为了思考在事件中或者之后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为了知道它作为一个体系的一个因素意味着什么而去调查这个事件。
- ⑫参见巴迪欧的《圣保罗》中关于“事件”的讨论。巴迪欧声称“真理与任何社群主义的子集成斜对角,既不声称权威也不构成任何身份(这显然是最微妙的一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巴迪欧在此,如他在此著作的其他地方一样,排除了任何“女性的事件”的可能性,因为,首先,他将“女性”划分为一种身份;其次,他断言所有的女性的身

份都出自于社群主义。显然,我并不认同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我来说,“女性事件”既不是性身份也不是一个社群主义事件。它不是性分化的条件或情境,不是基本的女性气质,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女性,等等,它是别的什么。而我们最能肯定的一点是,它绝对是一个被给予了保真性(fidelity)的事件,因此是一个“真理”。我既没有生产一种圣经式的事件,也并不需要这么做。很明显,我与巴迪欧的不同在于关于史实性的问题以及用他或拉撒路的话来说,关于事件地点的问题。根据巴迪欧的话,“事件地点是那个内在于某个情境的基点,它加入到事件自身构成之中,将其带入到这个独一无二的情境中而非别的”(第70页)。我虽然大体赞同关于事件构成的问题化,但我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建立其中的关系的。

- ⑬白露等人主编的《环球摩登女郎研究》(Duke University Press, December 24, 2008)。环球摩登女郎研究合作项目成立于2000年的华盛顿大学,它详细记录了在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南非、欧洲以及美国兴起的一个可辨识的全球现象。我和我的同事艾利斯·温鲍姆(Alys Weinbaum)、蒲丽迪·拉玛莫西(Prit Ramaurthy)、琳恩·托马斯(Lynn Thomas)、尤塔·波伊格(Uta Poiger)以及董蕙(Maderleine Dong)是这个项目的合作创始人。正如我们公布的研究成果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是论证“在20世纪上半叶,摩登女郎差不多是真正意义上从世界各地浮现出来”。因此,这个项目在其结构上天生就具有其世界规模。《环球摩登女郎》一书阐释了与这个形象相关的本土问题,尤其是结构了被我们称为“情境”的种族构成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将“情境”议题问题化了。第二个合作研究组——“摩登女郎、殖民现代性与东亚”的总部设在东京的御茶水女子大学(Ochanomizu University)性别研究所。这个小组的关注点是在殖民地中的日本、现代女性以及摩登女郎现象。见伊藤内、坂本浩子、白露编辑《西化的女性与殖民现代性:20世纪20、30、40年代东亚的帝国、资本与性别》(2010,东京)。这一部分之后的部分源于与我在这两个合作组中的研究,但立场却与这两个有所不同。
- ⑭理查·威尔克《美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本土与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1995年第1期。
- ⑮庐古德编《再造女性:中东的女权主义与现代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安托瓦内特·伯顿《历史的负担:英国女权主义者、印度女性和帝国文化》,北卡大学州立出版社1994年版;比丽·麦曼《女性的东方:英国女性与中东,1718~1918——性、宗教与工作》,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斯皮瓦克《其他世界:文化政治学文集》,劳特利奇出版社1988年版。
- ⑯巴迪欧《圣保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我用我自己的话来阐释了巴迪欧的有关圣保罗作为基督教诞生事件中的一个真理主体是如何证明“普遍的特殊性”的。在巴迪欧的哲学中,他详细讨论过事件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参见皮特·哈沃德的作品《巴迪欧:一个真实之体》,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22页。
- ⑰在这一点上,我深受齐泽克对于主流女权主义的批评的影响。我认为,他准确地指出了不论有多少针对“女性主体”的

解构性力量,其中的每一部分又都能自动再组合,因为这种迭代反复(iterations)是成套绑定的。抑或这至少是我对他的思考的反思。他对此提出的是一个老观点,即主体的女性是不可能被解构的,因为它构成了象征体系。参见齐泽克《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阿兰·巴迪欧》,《南大西洋季刊》第97卷2,第235~261页;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⑱我需要感谢王伊曼即席发明了这个词。
- ⑲在这篇论文的更早版本《历史与边界》中,我使用这个卜内门的广告来说明为什么“超越边界”这一概念是不可行的。而在这里,我大体上使用了同一个实践个案来说明一个普遍性能指——全球的摩登女郎成为巴迪欧意义上的一个事件的历史基础。关于“边界”的观念分析起来令人无法忍受。关于在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情境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见白露在《中国女性主义中的女性问题》(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结论。
- ⑳㉑㉒㉓㉔阿兰·巴迪欧《非美学手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0、44、14、XVI页。
- ㉕参见梁庄爱伦《兜售幸福:二十世纪初上海月份牌与视觉文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㉖阿兰·巴迪欧《无限的思绪》,巴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93页。巴迪欧教授最近在其《世界逻辑(Logics of Worlds)》(连续出版公司2013年版)中澄清了其关于“我们的时代”的意义。
- ㉗阿兰·巴迪欧《非美学手册》(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 ㉘此处的对立(antagonism)使用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定义,即“一种关系,在其中,日常客观性的局限性被演示出来——这里的被演示出来,用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层意思,即那些无法被言说的却可被演示……(因为)社会性只作为建构社会的一部分力量而存在……对立,则见证了最终缝合的不可能,是对社会性的局限性的‘体验’。严格意义上,对于社会来说,对立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或者说,它们构成了社会的局限性,即后者充分构建自身的不可能性”(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沃索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 ㉙阿兰·巴迪欧《作为今天的问题》,载《理论写作》,连续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 ㉚我无保留地赞同巴迪欧的地方是他关于人权的批判,参见巴迪欧《伦理学:关于恶的理解》(沃索出版社2001年版)。这使我与斯皮瓦克(Gar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这样的女权主义处于同一阵营。她并不预设“女权即为人权”,也不支持女性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自由主义人权的问题的基本假设。
- ㉛参见皮特·哈沃德《巴迪欧:一个真实之体》,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47页。
- ㉜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作者简介:白露(Tani Barlow),1950年生,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T. T. and W. F. Chao 亚洲研究教授;译者杨迪,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陈静,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潘清)